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 施红 程静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时代之问,具有清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清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高质量发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现

高质量发展是坚持认识和实践辩证统一的体现。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最终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真理对实践活动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主要体现在发展质量上。从国内来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和积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国际竞争力都有了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养老、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亟待解决。过去“以GDP论英雄”的评价标准只能强化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实践发生了变化,认识也相应变化,高质量发展理论由此应运而生。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是我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在高质量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十年里,我国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从6300美元上升到超过1.2万亿美元;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强度从1.68%提升到2.67%……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可以说高质量发展理论经受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

高质量发展是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体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高质量发展理论始终坚持这一基本理念,体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重视生产力的继承和发展。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社会的联合生产者“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体现了对发展效益以及人这个发展主体的重视。高质量发展对于发展效益的强调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重视,与马克思的观点具有内在一致性。

高质量发展是在我们党不断推进经济向高级形态迈进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

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穷二白的局面,党中央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科学论断,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稳步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我们党始终强调发展,并且着眼于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不断深化对经济形势和任务的认识,提出适合当前历史阶段的发展主题。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的历次党代会都围绕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明确的要求,如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经济建设目标;党的十五大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根据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重大变化,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

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重视经济发展速度到要关注经济效益和结构,从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到主攻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可见,高质量发展是在经济发展不断跃升过程中形成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和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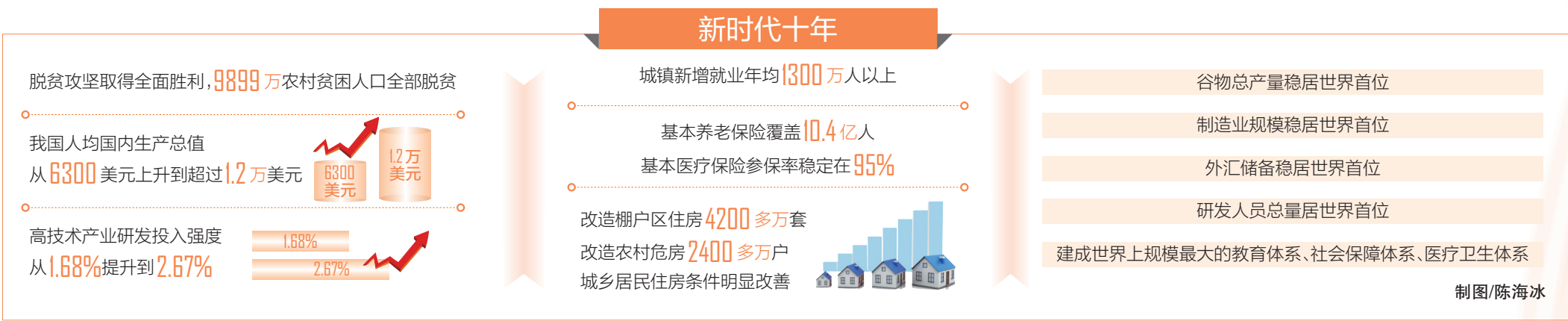
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我国已经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发展实践呼唤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巨大机遇,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加。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我们党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在这样国内国际形势下,关

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我们党给出了高质量发展这一答案。高质量发展具有如下特征:从供给看,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从需求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从投入产出看,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分配看,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从宏观经济循环看,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畅通,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落。这些特征表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完整系统、内涵丰富的理论。高质量发展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时代之问。

在新发展阶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主要是: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看,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从高质量发展格局看,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系看,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看,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看,实现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包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才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施红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区域室主任;程静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毕普云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党的二十大在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进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系统部署,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石

治理体系主要是各方面制度的集合。治理能力主要是依靠制度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有机整体,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了健全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才可能提高。有了高效的治理能力,治理体系才能发挥效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确保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鲜明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华,如,传承大一统理念而构建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传承德主刑辅、以德化人传统文化推动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传承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执政精髓,践行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传承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文化特征,提出共同富裕发展目标;传承和合文化精神,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同时,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现了鲜明的实践特征,用生产实践不断检验和完善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又一重大特征。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以全会的方式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

的二十大又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部署,充分体现了党着眼于时代变化、实践变化、形势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和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前瞻性和务实性。

中心任务的变化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主动求变。经过多年的努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现在起,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新使命新战略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积极改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之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主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保障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深刻变化。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品质更高、范围更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出现了多样化、更高层次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变化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主动适应时代变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的重要力量,成为大国综合国力较量的制高点。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生技术性变革势在必行。

坚定不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推进主体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要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的推进格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不动摇的根本原则,做到守正创新。

从空间结构看,乡村治理应着力转变村务管理方式,规范开展治理工作。要提升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吸纳广大群众、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积极投身农村公共管理和服务,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城市治理要着力于提高管理水平,推动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革新,提升管理精度、效率与实时响应速度,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把城市治理成果落实到群众切身感受上。

从制度保障看,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同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推进重点看,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强化监管立法和执法,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应用,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作用,通过政务服务等平台建设规范政府服务标准、实现政务流程再造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加强数据有序共享,提升政府服务和治理水平。

从技术保障看,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智能化,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以信息化智能化助推国家治理从经验治理向精准治理转变,从静态治理向动态治理转变,从碎片化治理向整体性治理转变。

(作者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共海南省委党校教务处处长、教授)